

政黨體系與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共治運作

張峻豪¹

摘要

共治乃總統與總理來自不同政黨（或聯盟），且總統所屬政黨（或聯盟）不在內閣組成當中，因此，在府會不一致下，共治將基於「總統、國會多數與內閣組成多數一致」、「總統、國會聯盟、聯合政府」的兩種樣態，體現政黨體系在其中的重要影響。於 1990 年代加入半總統制陣營的新興民主國家中，政黨體系的相對不穩定，是許多國家共同存在之現象，而在這些新興半總統制國家中，多黨制的政黨體系更是伴隨共治出現，並影響其共治運作的關鍵，基此，本文將選擇 10 個新興半總統制國家，比較其政黨體系與共治的關連性。首先，本文將藉國會有效政黨數的計算，展現相異政黨體系所形成的共治樣態，將共治再分類；其次，本文將國會的政黨體系延伸至其對政府運作與存續之影響，討論共治期間的政府組成以及內閣存續天數和政黨體系的關係。最後，本文將藉各國政黨體系影響下的共治運作案例，說明政黨體系的樣態及其零碎性是否實質影響憲政運作之穩定。本文認為，在政黨體系的因素外，仍應考量政黨聯盟的緊密性、總理角色、總統憲政權力，以及一國制度是否固著等因素，因此，政黨體系的穩固並非一定帶來半總統制便因共治而轉向內閣制的軌道，同樣地，政黨體系的零碎性也不必然會帶來半總統制國家在共治期間的不穩定性。

關鍵詞：半總統制、共治、政黨體系、國會

¹ 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通訊作者：張峻豪，E-mail: chunhao@thu.edu.tw

收稿日期：2019/03/10；接受刊登日期：2019/08/19

DOI:10.6284/NPUSTHSSR.202003_14(1).4

壹、前言

「共治」(cohabitation)不但是一項學術研究議題，也是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 system)國家的憲政發展課題，其在應然與實然面皆具高度研究價值(張峻豪，2016: 12)。從共治成因來看，由於共治多是基於總統與國會多數政黨(或聯盟)不同而產生，故突顯了「府會關係」在半總統制研究的重要性；另外，從共治的運作來看，由於共治常被界定為「來自不同政黨(或聯盟)的總統與總理」的共處狀態，故顯示了「行政權二元化」在半總統制分析的複雜性；再者，從共治的影響面來看，也因為共治常被認為是一個實權總統主動或被動任命一與其不同陣營的人士出任總理，而能彰顯「行政權向立法權負責」的憲政意義，並避免「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這個極可能引發憲政危機的類型出現(Elgie, 2008: 49-50)，故共治更代表與半總統制憲政運作穩定度之連結。

制度研究是以上、中、下游為結構，無論是探討共治的形成、運作或影響，都將因為「總統與國會間的政黨屬性」、「總統與總理的政黨屬性」，而脫離不了政黨這項因素，使政黨因素成為建構總統、總理、國會三角互動關係的重要基礎。由於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統與國會皆由民選產生，因此，總統與國會間的政黨屬性，開啟了共治出現的可能；另外，總統作為任命總理的發動者，其任命權的行使是否受到國會制約？以及，總理是否能獲得國會支持，使之在共治期間足與總統相抗衡？都與政黨因素密切相關。基此，本文認為，由於共治一方面是半總統制的重要運作類型，另一方面也是基於政黨因素而衍生的憲政選擇，故在釐清共治上、中、下游意義之前，實有深入剖析「政黨體系」(party system)之必要。

共治的發生，代表總統按國會政黨屬性而主動或被動選擇總理，進而使半總統制偏向內閣制的運作軌道，顯示出國會的政黨體系不但影響總統權力行使，政黨體系本身存在的多元面貌，更賦予共治豐富的運作內涵。在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中，最重要差異便在於兩黨制與多黨制的區別，依此，若以國會改選為例，半總統制國家總統所屬政黨或聯盟若失去了國會多數席次，並按照憲法規範而向國會多數妥協，則在此情形下，國會是否形成穩定多數，將直接影響內閣團隊之組成，並型塑了共治的不同樣態。

在共治的討論當中，若依據兩黨制與多黨制的簡要區分，首先，便是國會存在一穩定多數的情形，亦即內閣及內閣團隊按照國會多數黨或聯盟所組成，與總統形成共治局面，另一種類型，則是國會多數無法形成，在政黨結盟之前提下，行政部門以聯合政府之型態呈現，使得總統與行政部門的政黨屬性相異，同樣符合共治的意義。因此，加入政黨體系的變項來看，便如同 Robert Elgie 對共治所下的定義：「總統與總理來自不同政黨(或聯盟)，且總統所屬政黨(或聯盟)不在內閣組成當中」¹，正體現此兩種總統、國會，以及行政部門的基本型態。

¹ Elgie 在其研究資料庫曾說明：在此情形當中，若總統本身不具政黨標籤，亦即為無黨籍者，

承此，本文便主張，若要進一步分析共治的運作及影響，理解總統與總理如何在其中構築二元行政權之運作，以及，是否能體現內閣制的意義，進而影響半總統制的憲政穩定度，則在「上游」的研究前先依循政黨體系這個變項，透過「總統、國會多數與內閣組成多數一致」，以及「總統、國會聯盟、聯合政府」兩種區別，實有其必要。於 1990 年代加入半總統制陣營的新興民主國家中，政黨體系的相對不穩定，是許多國家共同存在之現象，而在這些新興半總統制國家中，多黨制的政黨體系更是伴隨共治出現，並影響其共治運作的關鍵因素，基此，本文將選擇 10 個新興半總統制國家，比較其政黨體系與共治的關連性。首先，本文將藉國會有效政黨數的計算，展現相異政黨體系所形成的共治樣態，將共治再分類；其次，本文將國會的政黨體系型態延伸至其對政府運作與存續之影響，討論共治期間的政府組成以及內閣存續天數和政黨體系的關係。最後，本文將藉各國政黨體系影響下的共治運作案例，說明政黨體系的樣態及其零碎性是否實質影響憲政運作之穩定。本文認為，在政黨體系的因素外，仍應考量政黨聯盟的緊密性、總理角色、總統憲政權力，以及一國制度是否固著等因素，因此，政黨體系的穩固並非一定帶來半總統制便因共治而轉向內閣制的軌道，同樣地，政黨體系的零碎性也不盡然會帶來半總統制國家在共治期間的不穩定性。

貳、文獻探討：從共治類型到共治經驗

事實上，有關半總統制研究，從來都難以脫離政黨體系的變項，而共治的議題更與此緊密相關。由於半總統制下的總統與國會議員皆由人民直選產生，故當總統與所屬政黨（或聯盟）與掌握國會多數席次的政黨不同，或者國會缺乏穩定多數時，總統會否任命代表國會多數意志的人士擔任總理？總理是否單向對國會負責？以及，閣揆能否實質掌握行政權？這些由政黨體系所衍生的共治議題，往往受到研究者高度關注。然而，也因為共治常被論者聚焦於總統與總理的行政權內部互動關係，而對總統、總理二者分別與執政聯盟（行政部門）和國會聯盟（立法部門）的互動較少提及，故面對新興半總統制國家在多黨制下常形成聯合政府的情形，本文便期望能透過政黨體系之貫穿，更充實總統、總理、國會三角互動關係的探討，並以此再檢視共治類型。

考察國內外關於共治運作經驗的研究，其實呈現了類型研究重於憲政運作經驗分析的情形，並且，經常是以運作類型之界定導引出共治類型以及行政權二元化在當中的意義。例如，呂炳寬、徐正戎（2005）便曾由府會關係、總統對權力之主導性，區分了「總統謙讓制」、「黨內共治」、「超級總統制」、「左右共治」、「聯合內閣」、「少數政府」六個類型；另外，如 Wu（1999），則採取「總統權力」、「府會是否一致」、「政黨體系」等指標，分類半總統制為「總統優勢型」、「相互

便無法稱為共治。有關 Elgie 長期追蹤並建立之半總統制研究資料庫，可參考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14）。

衝突型」、「國會優勢型」、「相互妥協型」；再者，林繼文（2000）以「總統與國會的政策距離」、「總統面臨議題之急迫性」、「總統主動權的大小」、「總統相對於國會的民意支持度」，建構了「總統干政型」、「無政府型」、「總統主導型」、「總理主導型」等類型，可謂更進一步強調半總統制下的權力互動細節。接續，又如 Tsai（2008），採取權力對比的方式，提出「總統主導的半總統制」、「總理主導的半總統制」、「國會主導的半總統制」、「總理與總統共治的半總統制」以及「總統與國會權力平衡的半總統制」等類型；而沈有忠（2004）亦由總統、總理與國會間的意識型態對比，提出了「權力集中的半總統制」、「行政權二元的半總統制」、「行政與立法二元的半總統制」，同樣是將類型研究進一步整合行政權內部互動，並結合總統、總理與國會權力運作細節。

從半總統制的類型劃分開始，近年來，隨著各國共治經驗的展現，相關研究更深入實際案例或進行跨國比較，來拓展此類型的研究意義。如林繼文（2009），曾以賽局理論為基礎，由共治在法國的慣例產生原因，對比臺灣出現共治的可能條件，可謂突破共治長期作為一種類型研究的重要文獻。另外，簡赫琳（2009）也由共治在法國第五共和的運作經驗，更細緻化分析影響共治過程的微量動能；此外，張峻豪亦曾在共治的次類型分析中，結合行政權偏向總統或總理主導的「規範面」，以及「超級總統」、「儀式性總統」、「總統與總理平權」的「運作面」，藉著跨國比較，進一步提出共治的六種運作樣態，將共治當作「中介變項」，以憲法規範與共治運作的對比，分析半總統制的運作穩定度（張峻豪，2011）。再者，以國外文獻來說，許多對於半總統制憲政運作實然之研究，凸顯了共治分析的重要變項。例如，Linda Kirschke 曾分析中非國家的總統與總理權力分享樣態，以及可能產生的危機（2007）、Oleh Protsyk 從總理—總統制與總統—議會制的分類出發，分析總統、總理之間的競合關係，以及所影響行政與立法部門是否產生衝突的原因（2006）、Thomas Sedelius 和 Ekman Joakim 則結合學者的類型研究，透過量化分析，以及內閣更替頻率的現象，探討中東歐的行政權內部關係（2010）、Dirk Leuffen 則是從法國的政策制訂過程重新詮釋法國的三次共治存在不同內涵（2009）。另外，對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共治研究，目前較為重要的文章乃是 Robert Elgie 比較共治對新興民主國家發展之影響（2010），及其與 Iain McMenamin 對共治起源的研究（2011），這兩篇文章可說是國內外就新興半總統制共治經驗最完整的調查成果，並且也是本文在個案選擇上的重要依循。

綜合上述研究，本文認為，正因共治的應然與實然對比愈益重要，故在共治的實際運作中，行為者和憲法規範會形成怎樣的互動關係？是否跳脫制度框架？對共治將產生哪些影響？都是使我們可以更深入共治的重要問題意識。基此，本文便以政治行動者與憲法規範間的互動為基礎，從政黨體系的運作來深入共治經驗。本文期望可突破僅由憲法規範檢視運作實然的單向觀點，藉此延伸類型運作的討論，故爾，聚焦在政黨體系的變項，從中分析政黨體系與共治運作的關連，本文希冀透過半總統制國家相異的憲政經驗，能描繪共治類型的不同面向，進而豐富類型與運作經驗之對話。

參、理論探討：政黨體系與共治經驗

有關政黨體系在半總統制研究的重要性，雖然相對較少於共治研究中被凸顯，但依然是值得關注的變項。有關半總統制當中的政黨體系分析，過去，較具代表者如 Cindy Skach，曾結合總統權力與政黨體系，認為總統權力將影響政黨體系的破碎化與否（2007），另外，國內如吳玉山，強調府會關係一致與否的重要性，並認為造成半總統制穩定與否，府會關係的因素比總統權力的因素更為重要（2002），凸顯出政黨因素的關鍵影響。而結合總統權力與政黨體系的關係，又如沈有忠，則在彙整相關文獻後認為：一般來說，總統權力越大的半總統制國家，搭配破碎的政黨體系，將使之往總統制傾斜，反之，若總統權力越小，搭配穩定的政黨體系，則向內閣制偏移的機率較高（2013: 22）。²

因此，源自半總統制的憲政兩軌特性，半總統制的實際運作究竟會向總統制或內閣制偏移，當然與政黨體系息息相關，而基於「共治」傳統上被認為是半總統制偏向內閣制運作的重要指標，因此，共治的出現與否？共治是否彰顯內閣制下「行政部門向國會負責」的意義？更凸顯了政黨體系在其中分析之重要性。³舉例來說，Petr Kopecky 在研究後共產的半總統制國家後便指出，由於其政黨體系大多是一「恩惠侍從主義」的特徵，政黨與市民社會的連結缺乏基礎，故選民的重組情形也偏高，而不利於內閣制運作（2008）；此外，Paul Lewis 也考察後共產國家的政黨體系，認為多黨制的情形往往不利於半總統制朝內閣制發展（2001），都可謂連結了政黨體系與「共治是否能實踐內閣制意義」的關係。

在後續分析上，為了要從政黨體系來明確區分共治運作的不同樣態，本文將以「國會與總統的政黨體系」作為主要界定來源。基於「府會關係」乃分析共治的重要起點，因此，透過歷次總統與國會選舉所型塑的政黨體系以區別各國共治樣態，將是深入共治經驗的基礎。在具體做法上，本文認為，府會不一致下所產生的共治局面，將隨「總統、國會多數與內閣組成多數一致」、「總統、國會聯盟、聯合政府」兩種類型，體現了政黨體系與共治的複雜性。具體來說，一個半總統制國家是穩定的兩黨制，或兩個政黨聯盟，還是多黨制，或鬆散的政黨聯盟，對於總統、總理、國會的三角關係建構，有著直接的影響。本文藉下圖表示兩種不同的共治樣態與政黨體系關係：

² 沈有忠在其著作中（2013），彙整學界關於半總統制下政黨體系與總統權力之分析。其認為，總統權力越強、政黨體系越破碎，半總統制越不穩定，已算是學界通說。

³ 例如，陳宏銘區分「國會主導」以及「總統主導」的提名總理權力（2007: 22-23），即呈現憲法規範和憲政運作對照的基準。例如，有關法國的共治情形，即被認為是在憲法規定總統任命總理無須國會同意的「總統主導」下，在後續憲政運作產生偏向國會為中心的模式，進而產生制度規範和運作之落差，在此模式中，法國總統讓出任命實權，選擇尊重國會多數的主張。但在偏向國會中心的憲政運作模式下，總統是否在共治期間願意甘於虛位，讓出行政主導權，便是內閣制能否獲得實踐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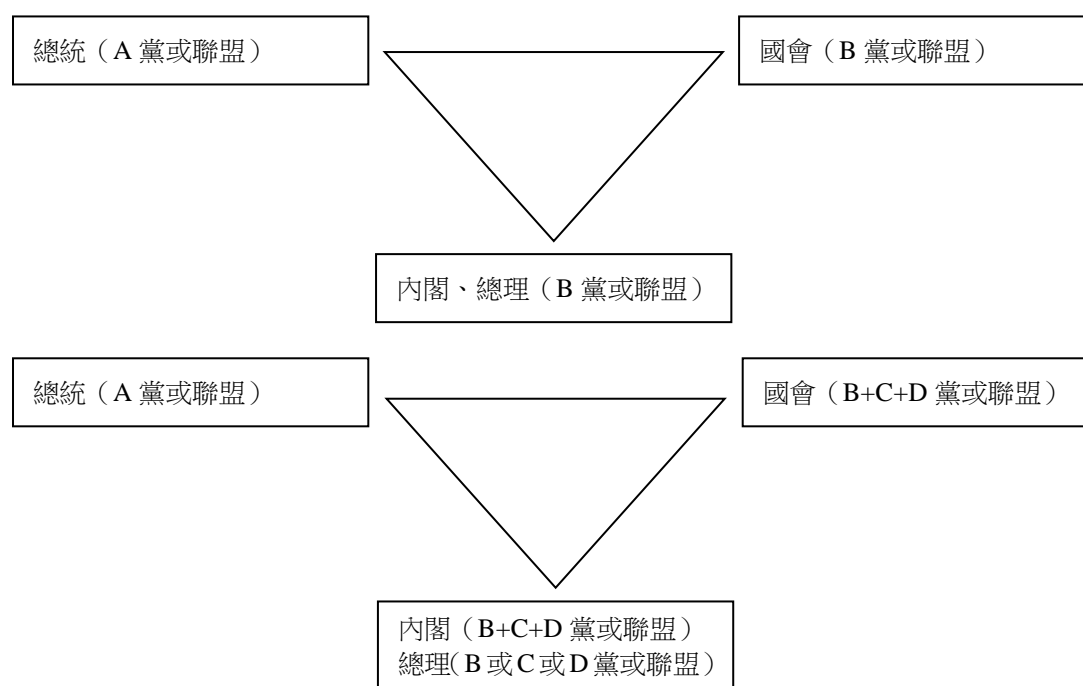


圖 1 政黨體系與共治的樣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本文在此簡化多黨制樣態，僅以 B、C、D 黨的代號來展現國會沒有穩定多數之情形，當然可能不與各國政黨數或經驗如實相符，不過，透過這兩種類型，本文期望可以彰顯多黨體系下的共治運作情形，並產生區別。依序說明：首先，第一種三角關係，表示國會具有穩定多數黨或多黨聯盟之情形，這也是多數文獻論述共治運作的基本架構；至於第二種三角關係，則用以表示國會沒有穩定多數的情形，亦即，在缺乏一個政黨或聯盟取得國會過半數席次的前提下，國會組成政黨聯盟，並依此決定了內閣組成。本文認為，於此種三角關係運作下，將因國會的政黨體系構成，強化了共治運作與聯合政府的關係，也就是，內閣運作的穩定程度，成為共治是否穩定的重要關鍵。

基此，本文在研究變項建立上，便由國會政黨體系出發，將其對比總統這一端，使國會政黨體系構成得以連結到內閣組成、總統角色，進而分析政黨體系下的行政與立法關係。有關此面向之界定，首先，本文將以有效政黨數（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的概念，釐清各個新興半總統制國家在國會中的政黨體系。依照 Markku Laakso 與 Rein Taagepera 所界定對於「有效政黨數」的一般化公式判準（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 71-81）： $N=1/\sum P_i^2$ ，本文由論者普遍採取的方式，來界定有效政黨數= $1/（政黨 a 席次率）^2+（政黨 b 席次率）^2+（政黨 i 席次率）^2$ ，來確認國會的有效席次數。

而在區別共治的不同樣態後，本文將比對政黨體系的離散程度，亦即由「有效政黨數」來看此兩種共治樣態下的共治運作。對此，本文主張，由於共治運作將直接與總統、總理如何共享行政權相關，故在其二者都有可能主張實權下，行

政權歸屬之相異樣態，即應成為探討共治運作的首要面向。其次，總統與總理在行政權內部互動模式，當然也與國會在其中的影響相關，所以，對共治運作的分析，本文亦將聚焦於總統與國會對行政事務主導權之爭奪（張峻豪，2015: 135），並於後續藉由共治案例之介紹來確認共治的運作內涵。本文認為，國會是否能保持「國會主導」的總理實質任命權，便是確認共治是否使「半總統制偏向內閣制運作」的重要指標。

肆、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共治經驗（1991-2017 的統計）

半總統制作為當今最多國家採行的憲政體制，特別是在 1990 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發生後更是如此。於新興民主國家當中，憲政選擇和民主穩定常是受到關注的議題，而對半總統制國家來說，由於共治帶來憲政運作的高度複雜性，使其與民主品質良窳更為論者重視。例如，研究民主化的知名學者 Linz 和 Stepan 即主張：共治在雙元行政權下容易導致憲政僵局，由於政策衝突與分歧往往造成統治者的正當性被質疑，使民主更顯脆弱（1996: 286）；此外，正因共治的發生意義行政權是在各自擁有民意基礎的兩個部門：總統與國會間運作，故論者也同意認為當一方不承認另一方的行政主導權時，共治便可能帶來憲政危機（Shugart and Carey, 1992: 57），此對民主初萌芽的國家尤其如此（Elgie and McMenamin, 2011: 616-618）。

按照前所提及 Elgie 對共治所下的定義，1990 年代加入半總統制陣營且發生共治的新興民主國家一共有十三個：包含：保加利亞（Bulgaria）、立陶宛（Lithuania）、蒙古（Mongolia）、尼日（Niger）、波蘭（Poland）、斯洛維尼亞（Slovenia）、聖多美普林西比（São Tomé and Príncipe）、斯洛伐克（Slovakia）、羅馬尼亞（Romania）、喬治亞（Georgia）、克羅埃西亞（Croatia）、東帝汶（East Timor）、塞爾維亞（serbia）等。基於本文是以政黨體系為主要變項，故在後續案例挑選上，本文將同樣依按照 Elgie 的分類，排除共治期間總統不具政黨屬性的國家，如克羅埃西亞、東帝汶，⁴另外，如立陶宛，自 2004 年起，其兩位共治期間的總統 Valdas Adamkus 以及 Dalia Grybauskaitė 都為無黨籍身份；斯洛伐克 2014 年 6 月至今發生的共治，總統 Andrej Kiska 亦為無黨籍；聖多美總統在 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的共治期間，總統 Manuel Pinto da Costa 同為無黨籍，本文也排除這些共治期間的資料收集。此外，由於塞爾維亞於 2006 年獨立為民主共和國，2007 年始首次進行國會選舉，其民主經驗尚短，故本文也未納入比較。以下，是本文選取國家的共治概況：⁵

⁴ Elgie 將共治期間總統不具政黨屬性的案例歸為「難以指認案例」。有關共治的國家定義、分類，可進一步參閱 <http://www.semipresidentialism.com/?cat=118>。

⁵ 有關共治時間與總統、總理所屬政黨（或聯盟）之列表，請參閱附表所示。

表 1 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共治列表（1990-2017）

國家	加入半總統制	共治發生	次數
蒙古	1991	1993.6 – 1996.7 1997.6 – 1998.4 1998.4 – 1998.12 1998.12 – 1999.7 1999.7 – 2000.7 2004.8 – 2005.6 2005.6 – 2006.1 2009.6 – 2009.10 2009.10 – 2012.6 2017.7-	10
聖多美普林西比	1991	1994.10 – 1995.12 1995.12 – 1996.11 1996.11 – 1999.1 1999.1 – 2001.9 2004.3 – 2004.9 2004.9 – 2005.6 2010.1 – 2010.8 2010.8 – 2011.9	8
波蘭	1990	1991.12 – 1992.6 1992.6 – 1992.7 1992.7 – 1993.10 1993.10 – 1995.3 1995.3 – 1995.12 1997.10 – 2001.10 2005.10-2006.7 2007.11 – 2010.4	8
保加利亞	1991	1995.1 – 1997.2 2001.7 – 2002.1 2002.1 – 2005.8 2009.7 – 2012.1 2013.5-2014.10 2014.11-2017.01 2017.01-	7
斯洛維尼亞	1991	2004.12 – 2006.1 2012.12 – 2013.3 2013.3-2014.5 2014.5-2014.9 2014.9-	5
羅馬尼亞	1992	2007.12-2008.12 2012.5-2014.12 2014.12-2015.12 2017.1-2017.6 2017.6-	5
立陶宛	1991	1996.11 – 1998.2 2003.2 – 2004.4	2
尼日	1993 1999	1995.2 – 1996.1	1
斯洛伐克	1999	2004.6 – 2006.7	1
喬治亞	2004	2012.10 – 2013.11	1

資料來源：修改自 Elgie（2009），加以作者自行更新至 2017 年

說明：聖多美在 2011.9-2012.12、2012.12-2014.12、2014.12-2016.9 也發生三次共治，但總統為無黨籍；立陶宛在 2004.11-2006.1、2006.7-2008.11、2009.7-2012.11、2012.11-2016.11 的四次共治；斯洛伐克 2014.6.15 至今的共治也是此情形，故不計入次數。

進一步，本文由府會關係改變、總理去職、其它因素等三項，歸類上述十個國家的共治成因：

表 2 共治主要成因與案例

共治原因	國家
A. 府會關係改變	國家
依照國會選舉結果	保加利亞第一次、第二次、第四至第七次共治 喬治亞 立陶宛第一次共治 蒙古第六次共治 尼日 波蘭第一次、第四次、第六次、第七次共治 聖多美普林西比第一次、第四次、第八次共治 斯洛維尼亞第一次、第五次共治
依照總統選舉結果	保加利亞第三次共治 立陶宛第二次共治 蒙古第一次、第二次、第七次、第八次、第十次共治 斯洛維尼亞第二次共治 斯洛伐克 羅馬尼亞第三次
B. 總理去職	國家
不信任案通過	蒙古第三至第五次共治 波蘭第二次、第五次共治 聖多美普林西比第三次共治 羅馬尼亞第二次共治 斯洛維尼亞第三次共治
組閣失敗	波蘭第三次共治
總理辭職或下台	蒙古第九次共治 羅馬尼亞第四次、第五次共治 斯洛維尼亞第四次共治
C. 其它	國家
總統所屬政黨離開聯合內閣或執政聯盟	羅馬尼亞第一次共治 聖多美普林西比第五次至七次共治
政變	聖多美普林西比第二次共治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峻豪（2016: 137）

從府會關係改變來看，毫不意外地，依據上表所整理，總統或國會選舉所衍生政黨屬性之改變，乃共治發生的最主要來源。如前所提及，從這個因素來切入共治的兩種樣態，在此之中，本文由國會或總統選舉結果所型塑的政黨體系來看，便可經由國會或總統政黨體系是否具有穩定多數。基此，從總統與國會選舉的結果分別來看，第一種類型：「總統、國會多數與內閣組成多數一致」的情形，在一共 30 個府會關係改變的案例中，共有 8 次，而另一種「總統、國會聯盟、聯合政府」的情形的多達 22 次。如下表所整理：

表 3 十個國家的共治不同樣態

	共治樣態 1： 總統、國會多數與內閣組 成一致	共治樣態 2： 總統、國會聯盟、聯合政府
蒙古	1993 年總統選舉後 (1) 2009 年總統選舉後 (9) 2017 年總統選舉 (10)	1997 年總統選舉後 MNDP+DU (2) 2004 年國會選舉後 MAKN+DU (6) 2005 年總統選舉後 MAKN+DU (7)
波蘭	2005 國會選舉後 (7)	1991 國會大選 PC+ ZChN+ PL (1) 1993 國會選舉 (SLD, PSL) (4) 1997 國會選舉 (AWS,+UW) (6) 2007 國會選舉後 (PO+PSL) (8)
聖多美	1999 年國會選舉後 (4)	1994 年國會選舉後 (MLSTP-PSD+PCD) (1) 2010 年國會選舉後 (MLSTP-PSD+PCD) (8)
保加利亞	1995 年國會選舉後 (1) 2009 年國會選舉後 ⁶ (4)	2001 年國會選舉後 (NDSV+DPS) (2) 2002 年總統選舉後 (NDSV+ DPS) (3) 2013 年國會選舉後 (BSP+DPS) (5) 2014 年國會選舉後 (GERB+RB) (6) 2017 年國會選舉 (GERB+PF) (7)。
斯洛維尼亞	無	2004 國會選舉後 (SDS, NSi, SLS, DeSUS) (1) 2012 年總統選舉後 (SDS, NSi, SLS, DeSUS, LGV) (2) 2014 年國會選舉後 (SMC, DeSUS, Social Democrats) (5)
羅馬尼亞	無	2014 總統選舉後 (PSD, LRP, PC, UNPR) (3)
立陶宛	無	1996 國會選舉後 (TS-LKD, LKDP, LCS) (1) 2003 年總統選舉後 (LSDP+LDDP+LRS+NU-SL) (2)
尼日	無	1995 年國會選舉後 (MNSD+PNDS)
斯洛伐克	無	斯洛伐克 2004 年總統大選後 (SDKÚ -DS+SMK+KDH+ANO) ⁷
喬治亞	2012 年國會選舉後。	無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說明：括號內的數字是發生共治的順序次數，聯合政府的成員以政黨縮寫顯示。另外，有關國會選舉後的年代指認，是以新國會組成的年份為主。

可以更肯定的是，從上述歸類的兩種樣態來看，共治在新興民主國家的運作實有必要因政黨體系的變項而有區隔，另外，正因為多數案例皆屬於「多黨制」的情形，致使共治作為半總統制下的內閣制實踐，也因政黨體系因素而有再確認之必要。本文發現，從第二項「總理去職」因素的發生來看，除了羅馬尼亞第二次共治，也都是導因於國會無法形成穩定多數而來。事實上，羅馬尼亞的案例非常特殊，雖未直接與府會關係改變連結，但也和政黨體系的離散有高度關係，羅馬尼亞的第一次共治發生，遠因是 2004 年國會選舉後，由 PNL、UDMR、PUR

⁶ 2009 年 7 月國會選舉，GERB 大勝贏得 116 席但未過半。GERB 雖未與其他政黨合作組成執政聯盟，然該黨的 Boyko Borisov 仍依法出任總理組成少數政府少數共治。

⁷ 因 KDH 離開執政聯盟，國會同意提早 3 個月在 2006 年 6 月舉行國會選舉，原本主政的 SDKÚ -DS 僅拿下 31 席，敗給左派的 SMER-SD (50 席)，退居第二大黨。SMER-SD 的 Robert Fico 出任總理，與斯洛伐克民族黨 (Slovak National Party, SNS) 和 ĽS-HZDS 共組政府。(Malová and Učeň, 2007)

(2005 年更名為保守黨 PC) 與 Băsescu 總統所屬的 PD 共組執政聯盟，但到了 2007 年 4 月時總統遭彈劾停職，PD 與 PUR 退出執政聯盟，故產生總統與內閣所屬政黨相異的共治，另外，2012 年 5 月，原本包含總統所屬政黨的執政聯盟遭國會通過不信任投票，改由反對黨 PSD 的 Ponta 出任總理並組成政府，(Gherghina and Miscoiu, 2013) 形成第二次共治，都顯現政黨聯盟在其中的脆弱性。

在半總統制下，由於民選總統和國會議員之並存，導致總統所屬政黨（或聯盟），可能和掌握國會多數席次的政黨（或聯盟）不同，進而加強了對內閣人選與行政事務主導權相爭之可能。諸多研究認為，總統對總理任命權的行使，乃是與「府會關係」最緊密相關的制度性因素，總統或國會在憲法上是否享有對總理實質任命權（無須經由對方同意），乃兩者相爭行政主導權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張峻豪，2015: 126）。然而，在此十個新興半總統制國家中，作者過往研究也發現，無論是國會對總理的信任機制、同意權，甚至是由國會主動提名、或直接由國會最大黨指名等規定，都顯示出這些國家都屬「國會主導」的規定（張峻豪，2015: 144），因此，這便印證了，國會政黨體系所衍生政府的穩定與否，將比總統被動或無法自主任命總理，更影響共治的存續。⁸

基於此，本文以下再整理兩種共治樣態下的有效政黨數及共治存續天數，並表現其相關性：

表 4 十個共治國家的有效政黨數與內閣存續天數

	共治樣態 1： 總統、國會多數與內閣組 成一致	共治樣態 2： 總統、國會聯盟、聯合政府
蒙古	1993 年總統選舉後 (1)：1.17，1183 天、 2009 年總統選舉後 (8)：1.96，1016、 ⁹ 2017 年總統選舉後 (10)：1.34	1997 年總統選舉後 (2) (MNDP+DU)：1.85，643 天、 2004 年國會選舉後 (6) (MAKN+DU)：2.23，307 天、 2005 年總統選舉後 (7) (MAKN+DU)：2.23，203 天、
波蘭	無	1991 國會大選後 (1) (PC+ ZChN+ PL)：10.87，182 天、 1993 國會選舉後 (4) (SLD+PSL)：3.88，496 天、 1997 國會選舉後 (6) (AWS+UW)：2.95，1149 天、 2007 國會選舉後 (7) (PO+PSL)：2.82，876 天

(續後頁)

⁸ 林繼文曾區分政府存續與存續力的定義 (2000)，其認為政府存續的定義是內閣領袖和組成政黨都沒有變動，存續力則是政府存續的月份除上政府所能存在最長的月份再乘上 100。例如，如果內閣總理最長只能任職 5 年，而其實際任期為 48 個月且其間內閣都是由同樣的政黨組成，則其存續力是 80。

⁹ 蒙古的計算是連同第九次的共治天數，因第兩次共治的政黨屬性相同，皆為人民革命黨，而第八次共治的總理桑吉·巴亞爾是因健康因素下台。

(接前頁)

	共治樣態 1： 總統、國會多數與內閣組 成一致	共治樣態 2： 總統、國會聯盟、聯合政府
聖多美	1999 年國會選舉後 (4) 2.36, 987 天	1994 年國會選舉後 (1) (MLSTP-PSD+PCD) : 2.36 : 294 天, 2010 年國會選舉後 (8) (MLSTP-PSD+PCD) : 2.59 , 385 天
保加利 亞	1995 年國會選舉後 (1) 2.73, 728 天、2009 年國 會選舉後 ¹⁰ (4) 3.34, 909 天	2001 年國會選舉後 (2) (NDSV+DPS) : 2.91, 182 天, 2002 年總統選舉後 (3) (NDSV+ DPS) : 2.91, 1302 天、 2013 年國會選舉後 (5) (BSP+DPS) : 3.15, 435 天、 2014 年國會選舉後 (6) (GERB+RB) : 5.06, 807 天、 2017 年國會選舉 (7) (GERB+PF) : 3.39
斯洛維 尼亞	無	2004 國會選舉後 (1) (SDS+NSi+SLS,+DeSUS) : 4.9 , 394 天、 2012 年總統選舉後 (2) (SDS+NSi+ SLS+DeSUS+LGV) : 4.73, 88 天, 2014 年國會選舉後 (5) (SMC+DeSUS+Social Democrats) : 4.15
羅馬尼 亞	無	2014 總統選舉後 (3) (PSD+LRP+PC+UNPR) : 1.94 , 349 天
立陶宛	無	1996 國會選舉後 (1) (TS-LKD+LKDP+ +LCS) : 3.54 , 455 天, 2003 年總統選舉後 (2) (LSDP+LDDP+LRS+NU-SL) : 4.22, 405 天
尼日	無	1995 年國會選舉後 (MNSD+PNDS) : 2.03, 340 天
斯洛伐 克	無	2004 年總統大選後 (SDKÚ -DS+SMK+KDH+ ANO) ¹¹ : 6.12, 749 天
喬治亞	2012 年國會選舉後。 1.97, 391 天	無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從上表所整理，可理解在國會缺少多數的共治樣態中，內閣存續天數顯然與具有多數有落差（僅有兩大黨的喬治亞案例除外）。首先，由有效政黨數所發現政黨體系高度不穩定的第一個案例：波蘭來看，其第一次共治，總統華勒沙面對總計 29 個獲有席次之政黨，提出的總理人選未能得到國會多數同意，但之後卻策動不信任案投票，致使內閣下台；到了第四次共治，國會改選後雖使華勒沙被迫提名波蘭農民黨的帕夫拉克出任總理（胡祖慶，1996: 75），但同樣在短時間內，總統以國會若未在三個月內通過國家預算，便有權解散國會（小憲法第 21 條），

¹⁰ 2009 年 7 月國會選舉，GERB 大勝贏得 116 席但未過半。GERB 雖未與其他政黨合作組成執政聯盟，然該黨的 Boyko Borisov 仍依法出任總理組成少數政府少數共治。

¹¹ 因 KDH 離開執政聯盟，國會同意提早 3 個月在 2006 年 6 月舉行國會選舉，原本主政的 SDKÚ -DS 僅拿下 31 席，敗給左派的 SMER-SD (50 席)，退居第二大黨。SMER-SD 的 Robert Fico 出任總理，與斯洛伐克民族黨 (Slovak National Party, SNS) 和 ĽS-HZDS 共組政府。(Malová and Učeň, 2007)

逼迫時任總理帕夫拉克下台。不過，1997 年新憲的制訂，除縮減總統權力，如國防、外交權外，亦將眾議院罷免總統的票數比例由 2/3 改為 3/5，造成波蘭在日後政治體制的定義上有一明顯的劃分（洪茂雄，2003: 2-3），甚至，展現了此種共治類型在制度影響下能造成行政、立法相對和緩之可能，這便是面對依然是聯合內閣之共治樣態，但其存續力表現較佳的主因。

其次，如斯洛維尼亞的案例，則呈現了高度零碎之政黨體系的情形。斯洛維尼亞總統雖由全民直選產生，但其體制相當接近典型內閣制，國家決策由政府 and 議會主導，法案多是政府所發動（Krašovec and Lajh, 2012: 206-207）。斯洛維尼亞眾議院擁有較多的功能，在監督政府的角色上，其也可使用「建設性不信任投票」來確保政府穩定性，使總統只能在國會以多數同意支持新總理候選人時命原總理去職，兩者之間的權力並不平衡（Krašovec and Lajh, 2012: 209）。因此，在零碎的政黨體系中，總理若可成為政治運作的中樞，將使政治趨於穩定（張峻豪，2015: 161）。斯洛維尼亞第二次共治時期的總理 Janez Janša 因貪污弊案而被提出不信任案而僅 88 天便結束共治外，後續繼任的兩位總理在高度離散之政黨體系中依然維持政府運作穩定，可謂回應了上述推論。

再者，立陶宛則表現出國會缺乏穩定多數導致政府運作較不穩定之情形。洪茂雄的研究指出（2003: 11-12），立陶宛獨立後主要兩個政黨對憲政體制的看法分歧，人民陣線贊成賦予總統較多的權力，認為一個強勢的總統可確保改革的持續進行；而民主勞工黨則傾向採取議會制，最終，兩大政黨互不信任導致立陶宛塑造了一個總統握有足以與國會相抗衡的實質權力，但卻是與總理、國會共築複雜權力平衡的體制。¹² Vello Pettai 和 Marcus Kreuzer 的研究指出（1998: 159），立陶宛的政黨組織制度化較弱，高度分裂的政黨系統，以及相當易變的社會分歧（societal cleavages）是主要特徵，因此，在第二次共治期間，總理 Rolandas Paksas 在 2003 年總統選舉獲勝，成為該時期總統；但在上台後，由於對制度的缺乏定見，導致總統、總理與國會政黨聯盟間的衝突持續存在，¹³甚至，引發政府聯盟與在野的祖國聯盟及自由與中間聯盟皆贊成草擬總統彈劾案，並同意對總統展開審判（Krupavicius, 2004: 1065-1069），最終，總統在一年餘共治後，便因此彈劾案而下台（張峻豪，2015: 159-160）。本文發現，立陶宛的共治情形是，總理對總統間的對抗，在多黨聯盟鬆散的情形下（Pettai and Kreuzer, 1998: 159），國會內部相爭反應在對於行政權主導的相爭。

¹² 按照立陶宛憲法規定，立陶宛總理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後任命並組織內閣。在新政府正式運作之前，必須提交一份政策草案給國會進行表決是否贊成；若在兩輪投票後仍無法獲得國會多數支持，內閣必須集體總辭。此一條款的設置不但確保內閣的施政能獲得國會過半數的支持，反過來說，政府的新政策亦獲得國會的背書，有助於維持政局穩定。

¹³ 2003 年 6 月，Paksas 總統提出「社會正義的最大重建（the maximum restoration of social justice）」主張，要求相關單位改進現有法律以防止公務人員違法獲取土地並加以處罰，2003 年 10 月，國家安全部門向國會議長 Artūras Paulauskas 提交 Paksas 總統和其一位國安部門的幕僚與俄羅斯犯罪集團有關聯的證據，引發國會成立專門調查國際犯罪組織，並試圖介入總統行政的特別委員會（Myers, 2004）。

另外，相較上述案例，雖同為多黨制，但具有相對穩定政黨體系數目的新興半總統制國家，如保加利亞，則表現出半總統制有偏向內閣制運作的可能。如沈有忠研究發現，保加利亞穩定的政黨體系，乃是為國會之穩定提供基礎（2013: 36）。在聯合政府的共治型態中，除了第二次共治時間雖短（肇因於國會選舉以後的 182 天及選舉新總統而結束共治），其它此類的共治時期則帶來體制的存續，究其原因，在聯合政府當中，保加利亞憲法給予國會較總統更顯著之權力，總統為一象徵性角色，無太多實權，總統沒有法律提案權，僅可以駁回法案使之進一步討論，這使得獲得國會支持的總理扮演著連結政黨、國會與政府的核心角色（沈有忠，2013: 41），而穩定政黨體系便成政府能展現存續能力之重要條件。舉例來說，即使是在少數共治的時期內保加利亞第四次的共治期間也展現總理獲得國會多數支持的實力，2010 年 3 月初，Georgi Parvanov 總統公開批評政府應付金融危機成效不彰，並與財政部長 Simeon Dyankov 發生爭執，執政黨以總統違反多達 15 條憲法條款為由發動罷免案，並獲其他右派政黨的支持，雖然，此事引發國會黨 GERB 與總統政黨 BSP 在國會的對抗更為激烈，2011 年 6 及 7 月反對黨曾二度提出對內閣的不信任案，但 GERB 的總理 Boyko Borisov 均能度過危機（Kolarova and Spirova, 2011: 5-6）。¹⁴

再者，本文也發現，一個相對穩定的政黨體系，也可能會由於政黨間歧見過大而影響半總統制運作，這在本文所指兩個非洲案例皆有此現象。非洲國家的政黨政治有極大相似性，即政黨間的分裂情形，此主要基於國內與國外因素之影響：在國內因素部分，非洲的社會形態普遍有經濟結構單薄、社會差異大、族群衝突激烈、宗教文化多元的特徵，同時非洲傳統上的社會結構以小單位呈現，因此政黨常難以結盟；在國外因素部分，西方國家出於自身需要，極力弱化政黨政治在國家政治的主導地位，大力扶持非政府與公民組織，導致其政黨碎片化加劇（王洪一，2013: 60）。基此，聖多美普林西比作為本研究唯一一個在共治後發生政變的國家、尼日亦是一個因共治導致民主崩潰的國家，其兩國政黨體系的組成內涵，是解釋半總統制穩固與否不可或缺之因素。

不過，仍須強調，即使是穩固兩黨制的共治情形，也不必然成為共治能造成半總統制運作穩定之保證。以喬治亞為例，2012 年 10 月的國會選舉，距離 Mikheil Saakashvili 總統任期屆滿僅剩一年，縱使總統坦承敗選並任命喬治亞夢想聯盟的 Bidzina Ivanishvili 為總理，總統與政府、國會的衝突依舊不斷。在這一年裡，總統至少進行 12 次否決，而國會全予以駁回；在人事任免方面亦有許多公開衝突（Elgie, 2013）。2013 年 2 月依據憲法，總統有義務在「國會」發表演說，然國

¹⁴ 有關保加利亞的政經發展概況，另可參閱貿易俱樂部，網址：<https://www.eximclub.com.tw/innerContent.aspx?Type=Publish&ID=3787&Continen=3&Country=%E4%BF%9D%E5%8A%A0%E5%88%A9%E4%BA%9E>。

會（總理）明顯針對 Saakashvili 總統的否決而拒絕總統於國會發表演說；¹⁵ 在對外關係方面，總統更是與總理的想法亦不相同。¹⁶

伍、結論

無論是從類型的對比來釐清共治意義，或者由個案分析、比較研究而擴展共治的解釋變項，在半總統制運作經驗更多元之當下，共治的分析應朝向憲政運作之細節，以及當中變項間的相關性，而可貼近共治複雜性。本文在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共治資料上，加入政黨體系因素，進行共治樣態與政府存續的初步探討，最重要目的便在於完整化共治的討論，並藉著細部資料展現，回過頭充實共治這項類型之內涵。

國會在憲法上享有對總理實質任命權之規定，普遍存在於新興民主國家，當總統與總理屬於不同政黨的共治類型出現，代表總統是在無法實質任命總理下，接受了國會的人選（Elgie, 2010: 31），故後續共治運作，國會的意願是否持續獲得保證，也就是內閣或總統是否願維繫行政向立法負責的內閣制精神，便成為分析共治是否能使半總統制導向內閣制的重要指標，然而，在此些國家中，往往就是因為多黨體系帶來的複雜性，使運作過程可能充滿艱辛。

本文發現，在新興半總統制國家中，共治的運作往往搭配著聯合政府以及國會缺乏穩定多數，這與我們傳統上認為共治乃國會與總理政黨屬性一致的樣態顯有不同，而政黨體系的離散度，以及聯合內閣在其中的脆弱性，當然就成為國會是否能團結對抗一個可能想方設法爭取行政主導權之總統，或者，總理能否具有堅實後盾來與總統放手一搏。

依照學界通說，一國政黨體系的破碎程度大，往總統制傾斜的機會高，若是向內閣制傾斜，則代表政黨政治破碎度較低，不過，從本文初步分析來看，聯合內閣之共治樣態，雖確實是存續力表現較差的原因，但在案例上，本文也發現，若總理可成為政治運作的中樞，將使政治趨於穩定，在高度離散之政黨體系中依然可維持政府運作穩定。另外，在多黨聯盟的不夠緊密下，國會的內部相爭將反應在對行政權主導性的爭奪，而成為共治不穩定之來源。再者，一個多黨制卻具有相對穩定政黨體系的新興半總統制國家，則會讓半總統制有朝向內閣制發展的可能。最後，我們也應該瞭解到，政黨體系之形成背景所影響政黨間可能歧見過大，也同樣影響半總統制的運作；甚至，即使是穩固兩黨制的共治樣態，也不必然確保共治的出現便帶來半總統制的穩定。

¹⁵ 參考資料來自 Georgia: Conflict Rather than Cohabitation，網址：<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6527>

¹⁶ 參考資料來自 Radio Free Europe，網址：<http://www.rferl.org/content/georgia-russia-foreign-policy-ivanishvili-saakashvili/24971738.html>

當然，本文從不同政黨體系類型來指陳對共治的影響，則有關政黨體系內部的運作細節，包含選舉、選間的聯合型態、國會內部在立法上的合作程度等更微觀之細節，也應是本文後續應當努力之方向。另外，限於篇幅，本文對於總統端的分析尚未能完整，也是一個重大研究限制；其中，有關政黨體系如何影響總統權力行使，例如黨內權力、個人風格、社會影響、以及所屬政黨在國會的行動等面向，都是分析總統共治期間的立場與行動的關鍵，這也是本文未來應努力之方向。不過，本文依然期望，加入政黨體系而豐富化共治的討論，並介紹較少被觸及的新興半總統制國家共治經驗，至少開啟了後續研究者對共治的不同視野。

謝誌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政黨體系、總統權力與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憲政實踐：以共治為例（107-2410-H-029-033-）的部分研究成果，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建議。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目

- 王洪一（2013）。〈非洲政黨政治的新特點和新趨勢〉，《當代世界》，12: 60-63。
- 吳玉山（2002）。〈半總統制下的內閣組成與政治穩定——比較俄羅斯、波蘭與中華民國〉，《俄羅斯學報》，2: 229-265。
- 呂炳寬、徐正戎（2005）。《半總統制的理論與實務》。臺北：鼎茂出版社。
- 沈有忠（2004）。〈半總統制下的權力集散與政府穩定：臺灣與威瑪共和的比較〉，《臺灣民主季刊》，1, 3: 99-129。
- （2013）。〈保加利亞「議會化半總統制憲法」的設計與運作〉，《政治科學論叢》，58: 17-46。
- 林繼文（2000）。〈半總統制下的三角政治均衡〉，收入林繼文（編），《政治制度》，頁 135-175。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2009）。〈共治可能成為半總統制的憲政慣例嗎？法國與臺灣的比較〉，《東吳政治學報》，27, 1: 1-51。
- 洪茂雄（2003）。《後共產主義時期波海三國政經發展情勢》。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胡祖慶（1996）。〈政治制度與政治穩定：以後冷戰時期的東歐為例〉，《問題與研究》，35, 7: 73-82。
- 張峻豪（2011）。〈半總統制運作類型的跨國研究〉，《問題與研究》，50, 2: 107-142。
- （2015）。〈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共治經驗與路徑多樣性〉，《東吳政治學報》，33, 2: 121-185。
- （2016）。《共治類型與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憲政經驗》。臺北：翰蘆圖書。
- 陳宏銘（2007）。〈臺灣半總統制下少數政府的存續：2000-2004〉，《東吳政治學報》，25, 4: 1-64。
- 簡赫琳（2009）。《探索法國左右共治中的微量動能——一個歷史的詮釋》。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二、英文書目

- Elgie, Robert and Iain McMenamin (2011). Explaining the Onset of Cohabitation under Semi-presidentialism. *Political Studies*, 59, 3: 616-635.
- Elgie, Robert (2008, 10). Semi-Presidentialism: An Increasingly Common Constitutional Choi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Choice, Performance, and Evolutio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 (2010). Semi-presidentialism, Cohabit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Electoral Democracies, 1990-2008.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5, 1: 29-49.

- Gherghina, Sergiu and Sergiu Miscoiu (2013). The Failure of Cohabitation: Explaining the 2007 and 2012 Institutional Crises in Romani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7, 4: 668-684.
- Kolarova and Spirova (2011). Bulgari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0: 922-928.
- Kirschke, Linda (2007).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the Perils of Power-Sharing in Neopatrimonial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0, 11: 1372-94.
- Kopecky, Petr (2008).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Krašovec, Alenka and Damjan Lajh (2012). Slovenia: Weak Formal Position, Strong Informal Influence? In Elgie, Robert and Sophia Moestrup (Eds.), *Semi-presidentia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 201-21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rupavicius, A. (2004). "Lithuani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3: 1059-1069.
- Lewis, Paul G. (2001). Introduc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In Paul G. Lewis (Eds.), *Party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c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pp. 1-15). London: Frank Cass Press.
- Linz, Juan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euffen, Dirk (2009). Does Cohabitation Matter? French European Policy-Making in the Context of Divided Governmen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2, 6: 1140-1160.
- Malová, D. and Učeň, P. (2007). Slovaki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6: 1096-1106.
- Pettai, Vello and Marcus Kreuzer (1998). Party Politics in the Baltic States: Social Bas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3, 1: 148-189.
- Protsyk, Oleh (2006). Intra-Executive Competition between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Patterns of Institu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under Semi-presidentialism. *Political Studies*, 56, 2: 219-44.
- Sedelius, Thomas and Joakim Ekman (2010). Intra-executive Conflict and Cabinet Instability: Effect of Semi-presidentia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5, 4: 505-530.
- Shugart, Mathew and John Carey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ach, Cindy (2007). The “newest” separation of powers: Semipresidentialism.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 5, 1: 93-121.
- Taagepera, Rein and Matthew Shugart. (1989).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sai, Jung-hsiang (2008). Sub-type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Political Deadlock. *French Politics*, 6, 1: 63-84.
- Wu, Yu-Shan. (1999, September). Taiwan’s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Cross-Straits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9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三、電子資料

- 張珮瑩 (2019)。〈保加利亞政經概況〉。貿易俱樂部，網址：
<https://www.eximclub.com.tw/innerContent.aspx?Type=Publish&ID=3787&Continen=3&Country=%E4%BF%9D%E5%8A%A0%E5%88%A9%E4%BA%9E>
。點閱日期：2019年12月1日。
- Brian Whitmore (2013). Georgia’s Changing Russia Policy. Retrieved September 7, 2019, from Radio Free Europe, Website: <http://www.rferl.org/content/georgia-russia-foreign-policy-ivanishvili-saakashvili/24971738.html>
- Elgie, Robert (2009).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 Retrieved September 7, 2019, Website: <http://www.semipresidentialism.com/?cat=118>
- (2013). Presidential Power. Retrieved September 7, 2019, Website: <http://presidential-power.com/?p=1716>
- Georgia: Conflict Rather than Cohabitation (2013). Retrieved September 7, 2019, from Eurasianet, Website: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6527>
- Myers, Steven (2004). Lithuanian Parliament Removes Country's President After Casting Votes on Three Charges. Retrieved April 7, 2018,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Website: <https://www.nytimes.com/2004/04/07/world/lithuanian-parliament-removes-country-s-president-after-casting-votes-three.html>

Party System and Cohabitation in Nascent Semi-presidential Countries

Chun-Hao Chang¹

Abstract

By centering on political party systems, this paper aggregates the effective numbers of parties and patterns of majority formation which assays the connectedness of political party coalitions with the executives and the parliaments in newly semi-presidential countries. Theorists often concentrate on the cohabitation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of the executive powers between presidents and prime ministers but less often refer to the relations through which presidents and prime ministers respectively interact with governing coalitions (the executives) and parliamentary coalitions (the legislatures). Hence, on examining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newly semi-presidential countries frequently form coalition governments under multiparty systems, this thesis promotes that the factors of the party influence of presidents, the executive orientation of prime ministers, or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parliamentary coalitions and of the executives, and so on, will complicate the patterns of cohabitation oper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arty systems to examine the triangle relations among the presidents, the prime ministers and the parliaments, through which the types of cohabitation can be scrutinized. This thesis gathered materials in ten countries and investigated profoundly and thoroughly these countries' cohabitation experiences. This paper will also make comparisons of political party systems during the cohabitations, and see how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s deepen or convert the implications, and embody the "formation" and the "shift" of cohabitations in these newly semi-presidential countries.

Keywords: Party System, Cohabitation, Semi-presidential Countries, Congress

¹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Chun-Hao Chang, E-mail: chunhao@thu.edu.tw
Received: 2019/03/10; Accepted: 2019/08/19